

## 延安的鐵菩薩 在整風運動中抓特務

吳一迪  
(Wu Yidi)

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們有菩薩的心腸，但為了堅決鎮壓特務，我們又有鋼鐵意志。

——康生，《搶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sup>1</sup>

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的中央大禮堂，康生的這篇演講拉開了「搶救運動」的序幕，同時也開啟了自1942年2月中共發起「整風運動」以來最為冷酷無情的階段。本文通過討論國共兩黨的情報工作，揭示中共是如何利用國民黨對延安的軍事威脅和特務滲透發動了「搶救運動」。

1942至1944年延安「整風運動」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從中共自身的角度來說，大多數新近發展的黨員或是不識字，完全不瞭解馬列主義的農民；或是從國統區和淪陷區投奔延安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愛國和自由主義思想對他們的影響要勝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要在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群眾中建立起一個意識形態高度統一的黨。從外界因素來說，中共面臨着1941年開始的日軍大掃蕩和國民黨軍隊對邊區的封鎖。隨着國共關係的惡化，統一戰線逐漸形同虛設，國民黨取消了原本撥給延安的資助。這樣一來，物資的缺乏與軍事上的威脅使得提升全黨的紀律和士氣成為當務之急。<sup>2</sup>

作為一場精心策劃的運動，「整風運動」歷來被看作是中共革命最終走向成功的轉折點。<sup>3</sup>然而「整風運動」也有不光彩的一面，在高層政治上有毛澤東和王明的鬥爭；在基層則是幹部的全面思想改造，包括組織學習黨的文獻和自我批評。思想層面的改造運動最終轉變成更為激烈的審幹和反特鋤奸。



圖7.1 康生 Wikimedia Commons 圖片



圖7.2 《搶救失足者》 孔夫子舊書網圖片

「搶救運動」與蘇聯1930年代斯大林統治下的大清洗運動有相似之處：例如刑訊逼供，幹部之間互相疑心，人人自危。<sup>4</sup>二者之間的聯繫與康生的作用密不可分。在1937年底與王明一同回到延安之前，康生在莫斯科待了四年。其間他學習了秘密警察的技術，不但目睹了斯大林的大清洗，或許還迫害了一些在蘇聯學習的中共成員。<sup>5</sup>康生把斯大林式的肅反策略帶回延安，成為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負責情報和安全工作。康生在1941年8月被任命為幹部調查委員會主席，1942年7月則擔任中央總學委副主席（毛澤東擔任主席）。<sup>6</sup>同時頂着這三個頭銜，康生把文件學習、審幹與反特鋤奸結合在一起就毫不意外了。

西方學術界很早就開始關注「整風運動」，但是延安整風與「搶救運動」的關係一直存在爭議。<sup>7</sup>儘管康生一次同時身兼多職，學界並未總把整風與搶救聯繫起來。西博爾特（Peter Seybolt）在1986年發表的文章〈恐懼與服從：反間諜運動，整風，和群眾運動，1942-1943〉是第一篇對「搶救運動」的英語論文。西博爾特的研究表明，中共在戰時的反特務行動是為了應對來自日本和國民黨真實存在的威脅，同時也作為統一全黨和加強組織紀律的有效工具。<sup>8</sup>

在中共官方的黨史敘述中，康生是「搶救運動」所有錯誤的罪魁禍首，而毛則發動了「正確」的整風運動，並且在「搶救運動」出現擴大化時及時將其中止。但是康生絕不可能在沒有毛的支持下單槍匹馬地發起運動。官方的這種敘事故意把整風和搶救兩個運動分開，目的在於確立前者的正面形象，而把後者歸結為運動的「擴大化」。與官方說法相反，一些學者認為搶救運動是整風運動的重要環節。在《延安的陰影》一書中，陳永發討論了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責任問題，以及反特行動中依靠群眾路線所產生的問題。<sup>9</sup>戴晴在《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中通過康生的演講把整風和搶救運動聯繫起來。<sup>10</sup>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將延安整風的源頭上溯到1930年，並且確認了毛在通過整風運動而進行黨內鬥爭過程中的核心作用。<sup>11</sup>

目前關於搶救運動的研究很少認為運動中所宣稱的特務真實存在，因為運動的倖存者和後來學者的研究大都認為所謂的「特務」都

是屈打成招，最終都被認為是冤枉的。與韋思諦 (Stephen Averill) 對1930年「富田事變」的研究類似，我感興趣的是「恐懼和緊張的氣氛」是如何激起鎮壓的。<sup>12</sup>搶救運動中的確存在着很多非理性和不公正，但本文的研究表明，國民黨特務的確成功地對延安邊區政府進行了滲透，這就促使中共加強了審幹和反特鋤奸。<sup>13</sup>（導致搶救運動的）另一個被忽視因素則是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後國民黨對延安的進攻計劃。我認為國民黨的軍事威脅是真實存在的，但在延安的中共領導人早已通過安插在胡宗南身邊的間諜得知了詳細的進攻計劃，並且有意識地以一觸即發的內戰為理由發動了反特鋤奸。總之，中共對國民黨的軍事威脅和特務滲透保持警惕無可厚非，但同時有意識地誇大了內戰爆發的可能性，大大高估了可能存在的特務，並以此為理由發動了「搶救運動」。

### 特務在延安：戴案中的國民黨特工

日寇和國民黨訓練了大批偵探奸細來破壞我們，國民黨特務分子、破壞分子，……他們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國青年，而是將許多有為的中國青年，拉到特務的罪惡泥坑中去為日寇的第五縱隊服務。

——康生，《搶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sup>14</sup>

國民黨軍統做夢都想派特工打入延安，從內部瓦解中共。<sup>15</sup>儘管這一目標從未實現，但是國民黨絞盡腦汁對邊區進行滲透，在延安建立情報站。軍統在1935年10月於西安成立了軍統西北局，任命張嚴佛為局長。1936年，軍統頭目戴笠下令建立一個特別警察訓練班，旨在訓練特工打入延安。<sup>16</sup>半年之後，受訓完成被派往延安的特務們都跑了回來，據說是因為無法忍受延安的艱苦生活條件。<sup>17</sup>1938年，張嚴佛把特務汪克毅安插到延安電報局工作，但是汪在幾個月後同樣返回，抱怨他無法在中共分子的包圍下工作。<sup>18</sup>1942年，戴

笠向延安派出了三名刺客，但是最終無人成功刺殺中共的任何領導人。<sup>19</sup>時任侍從室第六組組長，主管軍事情報工作的唐縱在1942年8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晚在羅家灣座談會討論共產黨問題，切實檢討，對共黨毫無內線，所得報告，皆空泛無所據，至可驚嘆！」<sup>20</sup>

儘管上述滲透延安的努力皆歸於失敗，中共邊區在國民黨情報機構面前也並非滴水不漏。1940年10月，慶陽中學教師吳南山主動交代他曾在軍統漢中特訓班受訓，此特訓班由戴笠在1939年建立，用於培養間諜打入延安。<sup>21</sup>在1942年遷至西安前，漢中特訓班共培訓八期學員，每期30人。<sup>22</sup>特訓班由戴笠信任的程慕頤負責，程曾經破壞了一個中共在江蘇的地下組織，並且在來到漢中前就在他的家鄉溫州辦過一個類似的特訓班。<sup>23</sup>戴笠對漢中特訓班寄予很高期望，在1940年秋季的訓話中，他告誡受訓學員，「要從共產黨手中拉回群眾，從日本人手中拉回漢奸。」<sup>24</sup>

對於國民黨情報機構來說，漢中特訓班的學員能夠成功打入邊區實屬不易。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在於，國民黨不再像從前那樣派遣喬裝的警察和商人進入延安，而是開始發展知識青年為間諜，因為中共此時正號召全國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在1939年12月〈中共關於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毛澤東承認中共過去忽視了知識分子，明確提出「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sup>25</sup>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來到延安，為中共注入了新的能量；同時也為國民黨情報機構提供了機會，後者利用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歡迎，向延安實施滲透。具體的做法是，國民黨有時會在途中沒收前往延安學生的學校推薦信，或者乾脆在學生上路前給他們洗腦。<sup>26</sup>漢中特訓班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很多受訓的青年學生都是當地人，在邊區有朋友或親戚，因而出入邊區較為容易。<sup>27</sup>

漢中特訓班的學員之一叫吳南山。根據郝在今的研究，吳南山高中畢業後擔任一所小學校長，由於和當地的國民黨地方官員的衝突而被免職。二十多歲的吳南山懷着報國之心報考了漢中特訓班，結果到地方後才發現所謂的「戰時游擊戰術幹部訓練班」不過是一所培養反共間諜的訓練營。<sup>28</sup>訓練班紀律嚴格，除了教授孫中山和蔣

介石的著作和專業特務訓練之外，學員們還要學習由已經叛變的前中共總書記張國燾編寫的教材，以便更好地瞭解中共。吳南山在特訓班中假裝積極，但是他心中並不相信教官對中共的妖魔化。他編造了一個理由以便提前畢業，回到家鄉。與此同時，在吳南山的家鄉慶陽，一個約3,000人的縣，當地群眾趕走了國民黨政權，建立了中共政權。吳南山回鄉後在一所中學教書。<sup>29</sup>

1940年底，吳南山棄暗投明，向當地中共保衛部門交了自己的受訓經歷。但中共並沒有抓捕或處決他，而是發展他為中共工作，準備「釣」出更多來自漢中特訓班的特務。通過吳南山等特訓班成員，中共的保衛部門順藤摸瓜，愈來愈多潛伏在邊區的國民黨間諜浮出水面。到了1941年中，中共已掌握了一批潛伏在邊區的漢中特訓班特務名單。1941年10月，吳南山意外碰到了特訓班的同學祁三益，後者畢業後留在特訓班任教，因此瞭解吳南山離開後特訓班派的學員情況。<sup>30</sup> 祁三益在當天即被逮捕。通過祁三益，愈來愈多的特訓班學員被發現。到了1942年5月，中共掌握了所有潛伏在邊區的特訓班成員的情況。<sup>31</sup>

中共保衛部門很快對這些特務實施抓捕。其中一些特務在學校學習，另一些則已經滲入邊區政府部門工作，有的被提拔當幹部，其中竟然還有一組三名特務在中共的軍事安全部門工作。<sup>32</sup> 大多數特務在被捕後都坦白交代，一方面是他們不想讓生活在邊區的家人親戚受牽連，另一方面則由於中共允諾對坦白者寬大處理。<sup>33</sup> 很多人後來被策反，轉而為中共從事情報工作。1942年底，大多數在邊區的國民黨間諜都已暴露，根據不同的抓捕時間和範圍，估計人數在32到56人之間。<sup>34</sup> 直到1943年春天，戴笠才得知派往邊區的漢中特訓班學員都已落網。惱羞成怒之下，戴笠將負責人程慕頤免職，關閉了特訓班。<sup>35</sup>

但是國民黨特務的數量和滲透程度還是把中共嚇了一跳。這次間諜事件被稱為「漢中特訓班案」，簡稱「戴案」，因為與戴笠有關。領導破獲此案的布魯（陳泊）贏得了「延安福爾摩斯」的美譽。<sup>36</sup> 儘管管康生並沒接手此案，但是他估計在1941年12月曾聽布魯提起此



事，並向後者借閱了案件資料。<sup>37</sup>康生後來向毛匯報此事，毛的反應是：「這個案子給我們上了一課，特別是給那些對蔣委員長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課。可惜我們的布魯太少了，今後要多調幾個像布魯這樣的幹部，來加強延安的保衛工作。」<sup>38</sup>康生認為「『戴案』給我們敲了一個思想上的警鐘」，<sup>39</sup>他的反思是：

這一案四十餘人都是青年，因此，我們審幹的重點對象也應該是青年，首先是外來的青年。其次，他們滲入到了邊區各個部門、各種工作崗位，可見他們的活動是深而廣的。面既然如此之廣，審幹、肅反也要做得廣些。<sup>40</sup>

在搶救運動中，來自國統區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成為主要的嫌疑人。如果說「戴案」讓整風運動進入了「審幹」階段未免言過其實，但是「戴案」的破獲與政治運動轉向幾乎在同時發生，這恐怕不是巧合。在「戴案」的調查過程中，中共意識到的確有國民黨間諜潛伏在邊區，「審幹」應該和「整風」同時進行，才能揪出特務。

儘管「戴案」確實讓中共在審幹上更加嚴格並有意識地加強反特工作，但是「搶救運動」則更多是一場捕風捉影的鬧劇。負責「戴案」偵查的是邊區保衛部門，而「搶救運動」則依靠大規模群眾路線，顯然大多數參與者都沒有情報工作經驗。很多「戴案」中的國民黨間諜最終選擇為中共服務，但是「搶救運動」中的「特務」從此在政治上有污點，在日後的政治運動中難逃厄運。儘管國民黨對邊區的情報威脅是切實存在的，但是「戴案」更多地成為後來政治迫害的濫觴。

## 張克勤案的迷思和真相

許多改過自新的人說：「共產黨是他們的重生父母」，從這些感激的聲音中，證明了共產黨寬大政策的偉大，黨的集體力量才是真正改造靈魂的工程師。

——康生，《搶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sup>41</sup>